

藁城文物

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

河北省藁城市委员会 编

藁 城 文 物

中国人民政治
协 商 会 议

藁城市委员会

《藁城文物》编纂委员会

顾 问	张树志	王普增		
主 任	牛振友			
付主任	李辰水	田克训	赵建忠	赵振杰
	张树国			
委 员	李国坤	赵红玉	鲍云峰	杨利华
	刘书俊	李文凯	陈素朋	梁清辰
	王连贵	米志科	常玉梅	何少梅
	申玉山	焦艳忠	李登肖	闫玉恒
主 编	申玉山	何少梅	陈素朋	
主 审	李国坤	赵红玉	王连贵	
编 务	杨利华	刘俊义	李登肖	闫玉恒

序

新编的《藁城文物》，适逢我市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付梓出版，值得褒扬。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人民智慧的结晶。藁城“物埠史丰，人杰地灵”，历史源远流长。流境藁城的母亲河——滹沱河，哺育了两岸儿女，孕育了古代文明，距今七千多年仰韶文化时期的人群（即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最早在这里生息繁衍，西汉元鼎四年置县，文物、古迹遍及全市不一而足。目前，已发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点五十余处，加之古寺遗址共达一百二十多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七处，出土各类文物五千多件。特别是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以铁刃青铜钺为代表的多项文物成为全国之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岁月沧桑，历史巨变，我们伟大祖国已阔步迈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征程，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编撰出版《藁城文物》，就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藁城文物》一书是藁城光辉、灿烂历史的缩影，不失为藁城古、近代文明史的颂歌、现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喜成果。它的出版发行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认识藁城文明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珍贵史料，必将加快藁城市文物保护和文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步伐，激发广大读者热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勇气，为藁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凝聚力量。感奋之余，还望通过这部《藁城文物》以展示藁城古代、近代历史文明为窗口，更好地宣传藁城，扩大藁城知名度，吸引广大志士友人了解藁城，认识

藁城，到藁城这块热土投资兴业，共创美好明天。

一部新作的问世，无不是众志成城的结果。筹划伊始，承蒙藁城市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成书之途，深得各级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及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悉心赐教；应当提及的，这部作品凝聚了文物专业有志之士的心血和汗水。值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鉴古知今，政清业兴。在新的世纪里，藁城市委、市政府必将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意气风发，求真务实，全面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把藁城建设的更加繁荣、昌盛、富裕、文明！

牛振友

2003. 12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编 古代文化遗址·····	1
台西商代遗址·····	2
前西关商代遗址·····	9
靳庄商代遗址 ·····	12
北龙宫商代遗址 ·····	14
禅房商代遗址 ·····	15
王家庄商代遗址 ·····	16
肥子国遗址 ·····	18
九门古城遗址 ·····	22
庄货头古寺遗址 ·····	26
附：藁城县志记载的历史遗迹 ·····	31
附：藁城古代遗址一览表 ·····	42
第二编 古代墓葬 ·····	44
南董元代古墓群 ·····	45
徐村石氏家族墓 ·····	47
五里庄刑部尚书墓 ·····	53
明代刘继墓志铭 ·····	54
明故承事郎浙川县知县刘公孺人候氏合葬墓志铭 ·····	60

西白露皇全墓	63
小果庄石棺墓	64
第三编 石刻文物	65
北朝石造像	66
宋代汉白玉石佛像	70
倪家庄古寺址出土石佛像	71
戒石碑	72
戒赌碑	74
靳庄李氏祖先迁民纪略碑	76
附：藁城市主要石刻文物一览表	78
第四编 馆藏文物	80
藁城出土尖首刀	81
瓷器珍品	83
铜器精品	90
佛造像精华	96
第五编 其 他	103
《淳南遗老集》与王若虚	103
藁城古今修志概要	106
高台庙（真武庙）	114
九门清真寺	116
天台寺	118
珍贵文物	121

第六编 附 录	125
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之最	125
二、藁城历代名人录	128
三、藁城历代名人录（附表）	138
第七编 近现代历史史迹及纪念地	140
梅花惨案遗址	141
三邱地道战遗址	151
藁城市烈士陵园	153
藁城县第一区烈士亭	162
藁城县第二区烈士亭	169
正藁县第三区烈士亭	180
梅花革命烈士亭	193
五界村烈士纪念碑	204
只照烈士亭	206
阜阳烈士碑	216
河西营烈士亭	218
大慈邑革命烈士纪念亭	222
寨里村烈士亭	225
藁城市近现代纪念地及文物一览表	229
后记	230

绪 论

藁城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腹地，紧邻省会石家庄市。198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全市总面积836平方公里，人口75万，辖14个乡、镇、1个省级开发区、293个行政村。改革开放以来，藁城市委、市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实现了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多年位居河北省十强县（市）行列。这座冀中平原上的新兴城市，既传承着藁城的古老文明，又焕发着年轻城市蓬勃的青春活力，素有“冀中明珠”、“河北粮仓”和“燕赵天府”之美称。

藁城不仅有发达的经济，更有令人羡慕的文化。藁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有人类在这里劳动生息，商代中期（约公元前14世纪）形成聚落，春秋时期为肥子国地，战国时期属赵、秦为巨鹿郡。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建县，元升为永安州，旋复为藁城县。历经2000多年风雨，造就了灿烂的文明历史。

藁城市由于地处太行山山前冲积坡地带，大量有机物长期淤积，土质肥沃，地上地下古河道遍布，水源充足，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滹沱河这条古老的母亲河，贯穿了藁城东西，孕育着两岸的儿女，创造了历史文明，遗留下了诸多文物古迹。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最早在这里劳动生息的是距今有7000余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即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这在台西遗址底层和故城遗址、南洛乡遗址出土的轮制圜底，红地红彩的陶钵等器物上得到了印证。

商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时代。而代表这个时期的文物、遗址，在滹沱河两岸分布极为广泛，几乎遍布整个藁城境内。已经发现的有台西、前西关、靳庄、北龙宫、王家庄、禅房、

张名甫、南洛乡、故献、阳台等商代遗址。兴安、南董等地多处砖窑土坑也发现有蛛丝马迹，可见商代社会在藁城地域已相当发达，距今 3000 年的台西商代遗址是冀中平原商文化的代表，在我国考古学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址以三个高大土台为中心，分别为西台、南台、北台，由墓葬和居住遗址构成，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3000 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 4000 余件，房址 14 座，墓葬 112 座，时间贯穿着商代中晚期。其中的铁刃青铜钺，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铁器，它把世界用铁的历史提前了 700 年；古老的医用手术器械即 3400 年前的手术刀，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脱胶麻织品——“麻布残片”的纺织水平已相当于千余年后的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麻织品。台西遗址不仅出土文物繁多，而且包罗万象，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珍贵文物揭示了冀中平原商文化的全貌，对研究商人与西北地区诸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探讨世界冶铁技术以及商代医药、纺织、占卜、酿造、文字、漆器、建筑、水利、农业等方面的起源和发展，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也为滹沱河流域的商代考古树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标尺。

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藁城北邻幽燕，南接卫郑，西通晋秦，东达齐鲁，自古即当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为四方文化荟萃之所在。因此，在这个历史发展中，藁城文化面貌反映强烈，文化特征多姿多彩。位于藁城市区西南的“肥子国”遗址，就是春秋鲜虞人所留下的一种文化沉积，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佐证。九门为战国时期赵国北方前沿重镇，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九门还曾在汉置县、唐置州，至宋开宝六年，才省入藁城，此后这座历经 1300 多年风雨的古城才冷落下来。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置藁城县，使藁城这个古老的城市有了 2000 多年的历史。其境内还有宜安古城遗迹，传说中的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点将台即位于此。通过调查在藁城境内发现了大型汉墓，其中，增村汉墓群、城南旧砖窑汉墓、梅花公主墓、北

洼汉墓和杜家庄汉墓群等历经了近 2000 年的风雨冲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有高大封土，可见当时规模之大，使人们从中了解到汉代盛行厚葬之风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混乱、大分裂时期。期间，社会经济尽管萧条，而文化艺术却有新的发展，藁城北贾同和庄货头出土的汉白玉石造像，证实了北朝佛教的迅速发展。出土的这批石造像，玲珑剔透、雕刻精细、形象逼真、技艺高超，令人惊叹。有的还漂洋过海，到国外展出，反映了北朝石刻艺术的卓越成就，是一批研究佛教历史难得的实物资料。

隋唐宋元，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时期的文化遗存数量明显增加，一些规模较大的地上建筑逐渐增多，从出土的石刻文物印证了藁城地面上的楼亭寺院，如城隍庙、书院、寺庙、碑林、石牌坊等大部分初建于这个时期，表明了当时佛教道教盛行的事实，同时也表明这些建筑和当时生产力发展迅猛，人们经济比较富裕有关，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藁城境内的名人显贵也层出不穷，唐代宰相倪若水为藁城人；金代大文学评论家王若虚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滹南遗老集》；元代开国元勋董俊、董文炳父子同朝为官，号称九子八国公，遗留下的董氏家族墓气势宏大，占地 900 余亩，墓区内松柏参天，碑刻成林，其神道碑就有九趟，汉白玉石像生高大雄伟、形象逼真。如此大型墓地实属少见，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藁城地处京畿重地，战争频繁，经过历代兵燹之后，人物彫耗、土地荒芜，户口存者仅三分之一。明永乐十四年徙山西诸户以实藁城，这在靳庄李氏家族碑刻上有所记载，弘治、正德、嘉靖以后，藁之户口于斯为盛，经济力量有所增强。据全市石刻文物普查，共查出埋有石刻文物的寺庙、墓冢等 150 余处，石刻、佛像，石碑等达 200 余件，多分布在藁城境内较大的村镇。城墙、衙门、寺庙、牌坊大多是这个时期建设或重修，可见人民的生活比前较安定和富裕。这个时期，达官贵

人在藁城遍布，徐村石阁老兄弟仕门显赫、尚书庄一代名刑张子麟、黄庄兵部、吏部尚书许守谦、许守用等均为朝中重臣，明开国元勋宣国公徐达的庄园在藁城也留下了痕迹，藁城可谓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文臣武将、青史留名。

藁城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英勇的藁城儿女为反抗封建统治、民族压迫，用宝贵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这里有在抗日战争山西忻口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原国民党爱国将领第九军军长、陆军中将藁城庄合人郝梦龄和芦沟桥事变打响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第一枪，从此揭开中国人民8年抗战序幕的藁城北席人何基沣。这里还留下了象征藁城人民聪明与智慧的三邱地道战遗址和控诉日军侵华暴行的梅花惨案遗址。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藁城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解放后藁城境内修建了许多烈士塔、烈士亭，上面镌刻着烈士英名2500多名，寄托着藁城人民对烈士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总之，藁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我们也试图通过这部文物专辑揭示藁城从原古时期到近代的发展脉络，以丰富市民的历史文化知识，从而达到热爱家乡、热爱藁城、建设藁城、促进藁城繁荣的目的，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编 古代文化遗址

古代文化遗址主要包括古代人类生存、居住、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城堡、宫殿、村落、作坊、居室、寺庙等基址以及一些经济性的建筑遗存。古代遗址往往与古代遗物相伴存在，共同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技术水平及文化面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遗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化石。人类通过对古代遗址的研究发现了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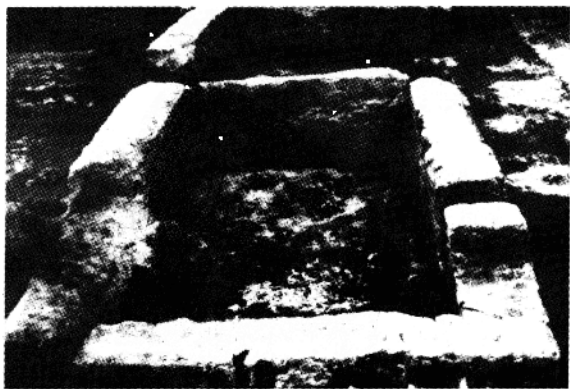
藁城境内古代文化遗址内涵丰富，数量众多，上自商周，下至明清均有人类活动遗迹。商代遗址遍布全市境内，多达十余处，尤其是台西商代遗址，充分揭示了商代中晚期冀中平原生活全貌，为我国商代考古提供了详实的文物资料，各类遗址，有的时间跨度大，价值高，比如九门古城址，自战国至北朝，都有古代文化遗存被发现，这些不同时代的古文化遗址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藁城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脉络。

张名甫、南洛乡、故献、阳台等商代遗址。兴安、南董等地多处砖窑土坑也发现有蛛丝马迹，可见商代社会在藁城地域已相当发达，距今 3000 年的台西商代遗址是冀中平原商文化的代表，在我国考古学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遗址以三个高大土台为中心，分别为西台、南台、北台，由墓葬和居住遗址构成，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3000 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 4000 余件，房址 14 座，墓葬 112 座，时间贯穿着商代中晚期。其中的铁刃青铜钺，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铁器，它把世界用铁的历史提前了 700 年；古老的医用手术器械即 3400 年前的手术刀，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脱胶麻织品——“麻布残片”的纺织水平已相当于千余年后的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麻织品。台西遗址不仅出土文物繁多，而且包罗万象，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珍贵文物揭示了冀中平原商文化的全貌，对研究商人与西北地区诸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探讨世界冶铁技术以及商代医药、纺织、占卜、酿造、文字、漆器、建筑、水利、农业等方面的起源和发展，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也为滹沱河流域的商代考古树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标尺。

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藁城北邻幽燕，南接卫郑，西通晋秦，东达齐鲁，自古即当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为四方文化荟萃之所在。因此，在这个历史发展中，藁城文化面貌反映强烈，文化特征多姿多彩。位于藁城市区西南的“肥子国”遗址，就是春秋鲜虞人所留下的一种文化沉积，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佐证。九门为战国时期赵国北方前沿重镇，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九门还曾在汉置县、唐置州，至宋开宝六年，才省入藁城，此后这座历经 1300 多年风雨的古城才冷落下来。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置藁城县，使藁城这个古老的城市有了 2000 多年的历史。其境内还有宜安古城遗迹，传说中的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点将台即位于此。通过调查在藁城境内发现了大型汉墓，其中，增村汉墓群、城南旧砖窑汉墓、梅花公主墓、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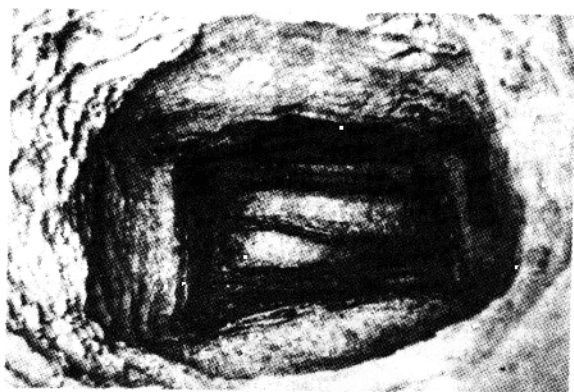
1973 年以来，尤其 1973 年与 1974 年两年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西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共计 2000 多平方米，获得了十分重要的科学成果，除发现房屋遗迹、灰坑（包括祭祀坑）、水井、墓葬外，还出土了 3000 余件器物，其中包括青铜器、玉器、石器、漆器、骨器、陶器、甲骨、原始瓷器、植物种仁以及医疗器械等。

遗址中发现的房址是我国商代考古的一项重大发掘成果。房址先后发现 14 座，其中二座系“半穴式”，其余均以木材为梁架、以夯土或土坯砌筑墙壁的地面建筑。房屋平面多呈长方形，间数不等，有单间、双间、三间之分。每间长 4—6 米，宽 3 米，有的房屋山墙异常坚固，至今残存一般 1 米左右，最高达 3.38 米。这在商代遗迹中极其罕见。屋顶形式以硬山式、平顶式和斜坡式最多。个别山墙开辟小型风窗，从而为后来的建筑上普遍设备“风窗”开创了先河。有的房屋四周划有白色的轮廓线，表明在当初营建时是经过事先设计的。有的房屋在营建过程中还用奴隶奠基。祭祀坑多在门前，其内埋入头骨和尸骨。这是在我国建筑史上使用人牲的最早例证。



第二号房址

遗址中发现的两眼水井，结构保存完整，井内遗存陶罐或木桶等容水工具。一号水井，井口为圆形，直径2.95米、深5.9米。井底用四层木桩构成“井”字形井盘，为加固起见，使用大小不等的木桩插入井壁。二号水井，井口呈椭圆形，直径1.38—1.85米、深3.7米。井底为长方形，所设木质井盘结构与一号井大致相同。我国的水井发明很早，至迟在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但是，这个时期的水井结构还很简单，井底不设井盘，提水容器也仅见陶罐。而首次发现的证据确凿的台西两眼商代水井，在结构和提水工具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为研究我国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历史增添了一项新资料。



第二号水井

发掘过程中共清理墓葬112座。从规模看，多为中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一般长2米、宽0.7米。有的墓底还有腰坑。从葬具、葬式看，大多有棺无槨，以仰身为主，俯身次之；从随葬品看，多数为日常生活用品。比较大型墓葬才殉葬奴隶，殉葬人数不等，少者1人，多者2人，其中有的生前受过两次刖刑，死后又被殉葬。

中型墓葬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以其用途可分为礼器、生活工具

